

品鉴

鲜活的集体记忆

——序《江东人家》

孙伟良

我国历来强调档案的国家属性，在县级以上设立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记录社会发展历史的官方档案。囿于体制、传统和条件限制，许多地方综合档案馆只是有选择地保存极少量的非官方档案，以致大量的非官方档案遗存民间。恰恰是这些非官方档案，更鲜活、更生动、更具体地反映民生百态，多棱镜般地折射社会历史变迁，成为国家档案的重要补充。一位法国档案学家曾经如此评价：“历史是不能只根据官方文件来写的，因为这些文件常常是语言枯燥，甚至有可能失去客观真实性，因此，必须用个人收藏的档案或私人档案来补充。”随着非官方档案的作用日益显现，宁波各地档案部门陆续将其付诸实践，家庭档案应运而生。

家庭档案是一个新词，特指以家庭和个体为特定对象、家庭成员生活经历为主体内容的原始记录，是家庭传递文明、友爱、幸福的纽带，为家庭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为家庭成长留住美好记忆，是促进家庭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家庭档案能入国家档案的“法眼”，是因为其记录的是个体经历，反映的是社会变迁，凝聚着国家的历史。作家王旭烽在《家国书》中有过精彩的论述：“中国人的国家构建由家开始，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家事即国史，家庭档案填补了国家档案的空白。各地蓬勃兴起的家庭建档热潮，使得国家档案这棵参天大树上新生了许多枝杈和果实。

江东区委档案局较早涉足开展家庭建档指导服务，他们把家庭档案的理念传播到社区工作中，通过上门指导、开展讲座、举办展览、评选示范、组建家庭档案联谊会、推动家庭档案展示交流等活动，向社会推介家庭在保存历史记忆中的责任，宣传家庭档案的作用，交流家庭档案的成果，培育了一批家庭档案的参与者。家庭档案成为江东区委档案工作的一个品牌，成为江东地域文化的一大亮点。

《江东人家》是江东区委档案局工作的成果展示，本书选取了来自不同行业的20位主人公，通过老照片和老物件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其中既有现实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有事业追求中的坚持执着，有家庭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也有成长经历后的人生感悟。不同的生活经历，各异的生活片段，反映了某一阶段的时代特征，定格了特定的历史画面，留下了共同的时代记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江东人家。本书图文并茂，集档案的真实性与故事的趣味性于一体，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轻松愉悦的文化餐点，也为江东人家的后代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档案的使命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国家记忆需要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这种记忆是共同的责任。（作者系宁波市档案局局长）



书人书事

书与夹藏

心 斋

翻看刚买到的一本二手书，九成新的书页之中，竟夹藏着一张崭新的人民币，这是一张新版的五元钞，我如同遇见了知己一般，暗暗高兴了一番。我是爱书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在书中夹藏点东西用以把玩的人。记得鲁迅先生也有此同好，他在《野草·腊叶》中说道：“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看到一片压干的枫叶来。”于是，他就在1925年的那个冬夜里，把玩着这片病叶，写下了这篇文章。

然而，我在书中夹藏的种类颇多，纸币只是其中之一，此外有邮票、漂亮的书签、难得的藏书票，当然还有各种好看的树叶。在所夹的树叶之中，我特别喜欢枫叶，这倒不是因为鲁迅在《雁门集》中夹了枫叶，我也仿效着。我记得，那是在杭州的老和山下读书的某一天，深秋的暖阳正和煦地照着我，我躺在邵逸夫科学馆楼前的草地上，时断时续地看着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那时正从屈原的辞句中醉心于美人香草，忽然看到头顶上火红的枫叶。我小心地摘了几片下来，然后把玩一番，其实就是挑拣一番，看看有没有瑕疵，最后才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书页当中。

从那以后，只要我在野外休憩读书，只要看见有形态、颜色俱佳的树叶，就会顺手摘来夹在书页中。而杭州的玉泉植物园实在是植物的天堂，植物品种众多，叶子千姿百态，我就时常摘几片夹藏着。后来工作了，夹藏的内容和范围也逐渐扩大，邮票、书签、藏书票、纸币、明信片一一进入书页中。每当我重读某一本书时，忽然翻出这些夹着的树叶时，犹如发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单是那些树叶，已经脱干了水分，艳红色的枫叶已经变成浅灰色，绿色的叶子也已经变成了枯黄，然而却没有脆裂，平整整的。于是在把玩之际，我回忆起当初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夹入书中的，从中收获别样的乐趣。

但是，书中的夹藏，有时候也给我带来烦恼。正如一个小财主东一处西一处地藏他的元宝，最后连自己也不知道藏在哪儿了。我也常常忘了哪一张明信片藏在哪本书里，哪一个珍稀的叶片夹在哪本书中。一次，我忽然想到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著名摄影师的作品，叫《床上的早餐》，拍的是一个美丽的母亲，她的孩子熟睡之中仍吮吸着她的乳房，照片拍得安静、祥和、温馨和神圣。我想找出它来，却左找右找不到，只能望着满柜的书长叹。

读书人爱书，若非遇到同道和信赖的人，自己的藏书是轻易不出借的。多年以前，在一次和熟人醉酒之后，有点忘形，于是慷慨地把人民文学版的一套四册的《崑山伯爵》借给了他，似乎没有约定归还的日期，却呵欠了几句：“请你保护好我的书！”然而，半年之后，当这套书回到我手中的时候，却已经一言难尽了。我心痛之余，忽然想到，书中不知是否夹着美丽的树叶、明信片和邮票之类……

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不再轻易出借自己的书，如果迫于情面要借书于人，除了干叮万嘱咐对方要保护好书之外，我还要仔仔细细地翻开每一张书页，去查看里面是否有自己心爱的夹藏。

三味书屋

尺牍当中的心性和人生

——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有感

傅晓慧



当下的文艺青年们爱读张爱玲，这是一个极富传奇性的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她堪称奇才绝艳，而在人生境遇上，她又领略了绝世凄凉。她于20世纪40年代声震文坛，乱世倾城，她辗转到了香港，后又赴美。从此，这个将人间世看得彻底悲凉、并不惜用最犀利的笔墨对此进行描摹的才女，再不曾返回故园。然而，人们至今还迷恋她的《金锁记》、《半生缘》、《倾城之恋》等作品。不过真正了解她后半生在美生活和创作状况的读者却不多，好在夏志清先生搜集了1963年5月至1994年5月间张爱玲给他的118封信件，整理出版了这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虽然所收并没囊括夏、张两人在那31年间的所有信件，但读者仍应感谢夏先生的有心保存。这些信件，不仅为中国文学史中的“张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普通读者揭开了张爱玲在国外深居简出生活的秘密面纱。

夏志清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学贯中西，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更是学界名作。众所周知，夏先生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甚高，他率先提出了张的文学成就居于大多数五四作家之上的观点。而夏、张之间也一直保持着一份诚挚的友谊。张对夏是尊敬和信任，夏对张则欣赏且关心。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件基本是在讲自己各类作品的改编、出版问题，用词言简意赅，但我们还是能从中间窥见她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创作轨迹。1963年，张爱玲准备翻译《金锁记》，因出版不顺，开始改写《北地胭脂》（即《怨女》），同时将

《十八春》改为了《惘然记》。20世纪70年代以后，她在信中提到自己正在进行自传性小说的创作，也即2009年出版的《小团圆》。在这过程中，我们总能看到张爱玲向夏志清的求助和感激。正是赖于夏先生的牵线搭桥和倾力推荐，张当时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才能由一些稿酬优渥的出版方出版，这对在美国从不曾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极为实际的一份援助。

客观来说，在美生活的张爱玲是落魄的。“世上无如吃饭难”，没有资历、学历，不擅交际，骨子里还带着点桀骜、清高的张爱玲，简直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那种“吃不开”人物的典型。然而身为性情中人的女作家，她一面紧赶慢赶翻译着《海上花列传》，以求早日出版，拿到稿酬。另一面却对《红楼梦》重新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地完成了《红楼梦魇》——“我本来不过是写《怨女》序提到《红楼梦》，因为兴趣关系，越写越长，喧宾夺主，结果只好光写它，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时间。”可见被生存压力逼迫着的张爱玲仍然倾向于“不功利的写作”。夏志清一方面觉得张爱玲太“傻”，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傻”充满了欣赏和赞叹！当时，几乎“离群索居”的张爱玲，除了和夏志清、宋淇及港台出版人平鑫涛等寥寥数个好友间还保持鱼雁往来，已很少和外界交流了。究其原因，除了性格使然，便是健康状态的每况愈下。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屡屡提到自己遭受病痛折磨，写作时间总被生病占去了：接二连三的感冒，久治不愈的牙疼，后来还患上了类似精神官能症的病。一次走在路上被人撞倒，竟导致肩骨骨折。于是1984年后，她给夏志清的信件越来越少。就是夏给她的去信，她也因体力不济而未拆看。可在她给夏的最后的一封信中，张爱玲提到了夏爱吃西瓜，夏的女儿爱吃洋芋色拉等无关紧要的细节。到此时，谁又能说张爱玲凉薄呢？对于那些真心关怀自己、帮助自己的友人，她的情感回馈同样是温厚的。

孤身一人，逝于海外，这凄凉景象和张爱玲的惊世才华是多么不匹配。无怪乎后人总爱用“华丽一生凉”来概括她的人生。但张爱玲自己也许并不自怜自艾！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诚感谢这个世界曾施予她关爱和暖意的张爱玲，一个沧桑历尽依然对创作有着无比热情的张爱玲。

本书中那个写信人早已不再是夕阳下身穿旗袍、用冷静而疏离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的女子了，她仅是个创作者、书写者，而且，她拼尽全部心血用笔墨书写了她的那个苍凉的世界，那段奇特的人生……

命运的追寻

——读帕蒂古丽长篇新作《百年血脉》

甘徐梅



去年读《隐秘的故乡》时，天也是灰蒙蒙的，如古丽的文字，朦胧沉郁，仿佛是一个黑暗的舞者在茫然地跳跃，宣泄着追寻的失落与痛苦的迷惘。故乡是那样的隐秘又遥远，但可怕的遗忘，却伴随着隐秘的沉痛不断涌进生命中，撕扯着古丽的灵魂，那时的她，是如此的无助与悲哀。可是，正因为艰难的生活没有止境，所以生长，也永无止境。几百个寂寞日夜的沉淀，让古丽得以爬过一道道时间的围墙，穿越岁月的漫漫尘埃，从血脉的长河中深寻到一条命运的踪迹——《百年血脉》一书，或许就是古丽的救赎之路。

古丽的灵魂一直在试图回归，所以她的文字也不断地打破一潭死水般的沉溺，始终走在路上。本书主角帕蒂玛担任着叙述者的身份，同样也是家族命运的一部分。几十年的人生里，她在无形中感知到了亲人相似的命运，于是，她开始不断地回忆，改变，寻找，曲曲折折，跌跌撞撞，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拾与逃离中，坚信又绝望。

或许有人会认为，古丽把一切写得过于沉重，可是，人生的有些事件往往就是不可言说的，它们会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的空间里，神秘地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继续着，流动着，牵引着，照亮着我们日益被蒙蔽的心灵。而古丽是幸运的，她坚持用自己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去抒写笔下一个又一个“她”的人生，在救赎自己的同时，也试图照亮他人的救赎之路，让我们得以抚摸各自内心深处深藏的静寂。

古丽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复杂的心理分析来对人物的性格进行解剖，同时也在这样的分析中隐

承了整个情节的发展。她以寻找哥哥、追寻女儿、定居江南为主线，穿插了姐姐、弟弟、前夫米夫、丈夫苏风，以及父亲与母亲的家族命运的一系列故事，使小说形成了细密的树状结构，脉络在“我”的寻觅中逐渐清晰——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使生存境况不断改变，人的精神家园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与挑战。

“从我们离开大南坡的这天起，我们一家，便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像用剪刀剪开的脐带一样，大南坡的土路，在我们到达城市的刹那，无奈地甩开了我们。”从此时开始，“我们一家”便逐渐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了生存，“我”从边城到西安，最后到江南，在辗转流离中遗忘了故土；姐姐为了生存，不得不从西安到广州、北京，最后去了澳门；弟弟没有离开，但是，从他被父亲送去给姨姨抚养后，或许就已经意味着失去了大南坡；而哥哥从西安到广州流浪，最后在生命垂危时回到了大南坡，在父亲逝世、母亲消失后，他成了整个家族精神家园的象征。“我”对他的追寻，不仅仅是想唤回亲人，更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重拾。可随着他的逝世，精神家园再次消解，“我们”不得不流浪得越来越远，以致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不仅是“我”与兄弟姐妹们在流浪，在“我”的不断追问中，发现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流浪。从百年前的太外公，到我，再到女儿苏菲亚，生存的境遇在不同的时代中，受到不同的挑战。在历史的延续中，无形中指向了那个民族命运的将来。那不仅仅是民族融合进程中产生的“不适应”，也不仅仅是城市与边远地区的矛盾，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当人渐渐失去了长期生存的故土后，精神与灵魂应该归向何方？

真实的命运往往比暂时的忧郁使人更多地担受痛苦，但也给人以更多的机会走向伟大，更多的勇气走向永恒。所以，读这本书，心灵必然是悲苦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一股不屈与隐忍的力量。不论“我们一家”如何流离失所，迷失逃亡，心却始终没有忘记过那个家。人的一生若真的是个轮回，那么在年轻时越走越远，也许就只是为了最终能够回到家园。民族的融合，城市的扩大，真正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抛弃家园，而应是更好地重建家园。

惠特曼说，生命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集会，它包括一切不幸的沉默的爱人。古丽便是其中一个。她始终用自己清澈的眼神，深情地眺望着生命的方向，希望能够在保持本真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觉醒。《百年血脉》一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它不仅关于时代与民族命运的思考，更是关于生存命运的无止境的追寻。

荐书

《美的历程》



作者	李泽厚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14年9月

一直听说这本书是美学领域标杆式的名著，不仅仅作家、画家、设计师，许多普通读者也把它当美学范本来学习。

作者以客观、理性、细致、节制的叙述，把近8000年中国文明（文化）浓缩、淬炼，取其精华加以梳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民间上层的意兴趣味，人文情怀的繁荣鼎盛，意识形态的变迁动荡，通过诗文书画、戏曲杂技、建筑雕塑、宗教艺术等种种形式，作了全景式的呈现。既有纵向的穿透深厚历史意义的巡视，又横贯每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兴衰消长，及文、史、哲、美学的起承转合。全书条理分明，疏密得当，于大处意象阔远，小处又剖析精微深邃，引经据典均有出处，足见作者的学问。

在书的结语，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此久远的早成陈迹的古典作品，为什么仍能感染、激动着今天和后世？新世纪的人们为什么要再去回顾和欣赏那些古迹斑斑的印痕？作者以为前者是艺术社会学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审美心理学问题。凝结在古典作品中的情理结构与今人相呼应，艺术作品打开了时代灵魂，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人性。

诚如作者强调“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古老文明至今仍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美的艺术魅力跨越千年而让今古共鸣，因文明是由人类创造的，可以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亦是投射着人类的演变史，人性与心灵的发展、成熟史。在人与物、人与器的对视中，传递与感应到的仍是人的情怀与襟襟。从这一点上说，美确实是可以永恒的，也就有了重新发现《美的历程》的必要。（推荐书友：莞静）

《给曾国藩算算账》



作者	张宏杰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15年1月

《给曾国藩算算账》视角新颖，从经济收支这一个人生活中比较隐秘的部分来反映当时京官的衣食住行，揭示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些规律。本书共分为五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分别讲述了曾国藩筹措进军资本、道光二十一年京官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典试四川“巨额灰色收入”与京官后期生活、清代京官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湘乡曾氏的乡绅生活。此外，还分析了同时代其他官员如刘光第、李慈铭等人的经济生活，立体呈现了晚清时代官员群体的经济生活特点。

透过这本书观曾国藩的一生，从经济上看，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身处当时那个年代，加之经济上的贫乏，入乡随俗也好，随波逐流也罢，曾国藩难以避免地带有当时那个时代乡读书记或官员的一些陋习，比如科举中试后通过拜客收受大量礼金，不断地接受馈赠和借货等等。但其本质洁，所以会不断反思，比如《曾国藩家书》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记载“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有些片段，读来让人唏嘘不已。曾国藩一生夙愿，唯唯书斋尚需添耳。

京官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至少经济上入不敷出是常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法定收入为129.95两，各种支出加起来却有608.46两，其中基本生活支出已占70%左右。节俭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奢靡官员的赤字想来可知。

这本书的内容能够让今天的官员得到警示和启发，此外作者“不虚荣、不隐忍，无臆想夸张之弊”的叙述风格，也值得学习借鉴。（推荐书友：洛风）

《博尔赫斯谈话录》



编者	(美)巴恩斯通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4年11月

阿根廷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中的作家、诗人中的诗人，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另一种经典范式和后现代主义的“鼻祖”。他深邃、博学，尤以擅于现实于虚构而臻于神秘的“迷宮”式构思著称，文体纯净而迷幻。

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羡慕他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同时又惋惜他的双目失去光明。然而，就像失聪并不能折损贝多芬的音乐才华，失明也不会伤害博尔赫斯的文学能量。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在博尔赫斯面前，“五色”自然遁形。博尔赫斯是语言大家，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他说当他想阅读叔本华的原著时，就把海涅的《漫歌集》找来，再找一本英德词典，把海涅的诗读熟了，德语也就领悟了。他的妻子玛丽亚·儿玉原是他的日裔女秘书，博尔赫斯作为东方人的女婿，对东方文化有另一种兴趣。他说，“我希望去中国和印度”。他的汉字水平有限，但他读过《道德经》翻译本，以及多种译本的《红楼梦》，他说这部小说就像书名一样美。嗯，博尔赫斯是一个文艺的精灵，他的开口与落笔是满满的文艺“辐射”。

《博尔赫斯谈话录》是一本访谈录，是美国诗人、学者、翻译家巴恩斯通在各种场合与博尔赫斯的谈话记录，对于博尔赫斯的思想输入带着原始性和本真性。巴恩斯通某次与西川相遇谈及这本访谈录草稿，西川就给翻成了汉译本。这是一本中国诗人翻译美国诗人访谈阿根廷诗人的书籍，诗意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推荐书友：方其军）